

从来故乡是水乡

田洪敏

心生恐惧的大家装骁勇，迅速排列成“保护妇女儿童”队形，借着手机的亮光走出洞口，蓦然就发现了海岸和渔村。好心的渔民未及惊诧“没有你们这么玩的”，就帮忙找来一辆小面包车把“归来的勇士”送到了最近的公交站。当晚大家都兴奋地发愿，要再来一次这个突然发现的渔村。当然，按照生活的逻辑，我们后来都没有再去，连这个渔村的名字也都忘记了，它就浮沉在记忆的潮汐里，一漾一漾地，偶尔上岸。

我不知道是连续几年没有在青岛过春节，还是觉得旧历中国年总是以“辞旧”为先，但目下据说连少年都会在此时怀旧。印象里青岛的除夕都是湿漉漉的天气，特别是到傍晚，潮湿的感觉甚至有些像是八月，空气都不怎么流动的样子，市肆也都安静下来。好像一切都恰恰好，符合我们对于“冬藏”世界的想象，仿佛这个旧历岁尾的日子就是用来原有时光原有自己的时刻。除夕夜里腾空炸起的烟花爆竹，都迅速变成红纸屑在地上回旋、舞蹈。一次年初一的早晨，我在李村公园公交站转车去妈妈家，车子来得慢，开得慢，乘客少得很，路边的红纸屑一路随风而行。那个时候也在想，这些是不是就是这个城市“北地胭脂”的一面了，不是就是悠远的“红底金字”的爱恋了——毕竟，青岛不太容易让人联想到“古老”。

至于游人喜欢的“红瓦绿树”，其实到了沧口区就变成了土黄墙壁。很多早期的产业工人定居在此，本土和外乡的青年人有着类似古老的名字：挡车工、上轴工、落纱工、机修工……后来我在上海读书，学校离曹杨新村不远，周围的小店里总是有质量特别好、价格又公道的羊毛衫，也从烫着大波浪、一笑眼睛弯弯的阿姨们手中买过自家厂子织的围巾，商标是“光荣”和“火炬”。沧口区保留了不少桥洞，上面跑火车，下班时桥洞下就成了“二八大杠”的洪流。《恋之风景》里，邮差刘烨就骑着这样一辆车沿着一个陡峭的弯路俯冲而下，至今也是可让人迷恋的风景。对于所有的海边城市，造物主的偏心远不止于大海，还有一个个峡湾。古老中国水系丰沛之处，美在弯曲。至今难以忘却《恋之风景》，并不完全因为它是在青岛拍摄，而在于它虚化了一座具体的城市，电影也没有刻意炫耀大海，诉说的都是远离海岸的世界。

方志、游记或者诗歌无不告诉我们：就在不算遥远的100年前，青岛这个城市还有着“登瀛梨雪”的美景，渔人借船驶入崂山的峡湾，上岸之后也许会发现山海之间有“渔村俨然”。对于所谓“梨花雨”的执念在2003年的《恋之风景》里也是一种真实，毕竟崂山余脉都是当地人躲避游人如织的前海的好去处。若干年前我和几位友人就是沿着崂山仰口一带“暴走”，竟于傍晚迷路进入了一个废弃的防空洞。

“成山角”外围暗礁重重，难建码头，围绕岛屿的海洋成了天然屏障。据说20世纪中叶，战火冲天际，这里也

不过是鬼子船过来“打亮子（探照灯）”，船只不敢靠岸，转去青岛上了岸。1980年代末所说的家人相聚，其实是爷爷一辈有人乡音未改地远游数年归来，一群人密密匝匝地排成好几排拍照，将爷爷家的小房子遮蔽得严严实实，后来大家都未曾再见。1990年代之后暴富的渔村里，余下的海草房就成了今日游人喜欢的民宿了。你能听到的故事，好像都是人们要去更远的地方打鱼了。小码头拆了，不愿加入大船队，只想“独乐乐”的渔民在家附近的“小海”也打不到鱼了。阿姨家的表弟近期的工作方式，妈妈表述为“在非洲钓金枪鱼”，印象中这个帅气的表弟一会儿养海带，一会儿和别人合伙包船打鱼。

至于青岛，台东六路上需要在冷风中排队才能吃到的面馆已经关门了。一直买杂志的报摊上，那对能干的夫妻也不知去向。“台东”现在是一个形同徐家汇的地铁换乘站，擦肩接踵，让人很是慌乱。来到一个你曾经熟悉的城市会怎样呢？那个感觉是不是就像出逃不及，撞倒了院子中央的水缸——全部溢出。虽然风从不需要为船改变方向，不过总有人似乎记得那些没用的事情。从前，极地海洋世界那里有个寂寞的咖啡馆，门口放着喂海鸥的食物，真的是影视剧“问一声那海鸥/你飞来飞去有何求”般的夸张情景。南方的海岸，短衣短衫有什么意思？北方的海凛冽无端，想在海边浪漫，必须要在沙滩上信步的狗儿跑得快点才行。后来听说那家咖啡馆倒闭了，乱石委地找不到，可见记忆有时也如“票房毒药”的文艺片，不叫好不叫座。

前些日子追剧，剧中有位重商重义的妖娆女子，却是来自青岛的平度路，我看了也不由会心会意。一间称作“杨柳依依”的时装小店原来就在平度路上，看店小妹自己就会裁衣。高速铁路刚刚兴起的时候，她凭借高挑和姣好考取了乘务员，后来发现自己当上的并非想象中的飞机“空乘”，才辞了工专心给一位跑日韩进货的老板娘看店。平度路周围，见证青岛近代商业历史的、错落无序的“里院”、海鲜市场、外贸小店和理发工具店都混杂着，一个从不允许议价的高冷男子持有一家卖各种袜子的店铺，拿出黄色的“拉卡拉”收钱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其间还有一家留人驻足的书店。有那么几年，平度路周围很多店铺都是写着大大的“拆”字。知道很多小店不在了，返沪之后便拜托友人写了“杨柳依依”四个字挂在家里。有访客问有何意，我就胡诌了一通景观群怨，总是要允许普通人拥有不再讲述故事的权

利，没啥花头。妈妈年纪尚轻的时候喜欢看电影《马路天使》或者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，喜欢王心刚。爸爸和妈妈与同时代人一样，念着不成熟的生意经的间隙，还没有忘记在家里组装电唱机，买“单卡录音机”，换“双卡录音机”，买于淑珍的唱片或者吴涤清的磁带。去岁妈妈来上海玩，带她去美琪大戏院看了越剧，老妈非常满意，还找了演员签名。

旧历中国年不管在哪里都是现代国人情感考古的最佳发掘时间：有风有雪有雨的时节，有“红底金色”的回忆，它符合所有情感呈现或者隐匿的加工程序；它就像是国风民俗的古老印玺，年轻的孩子们在，在包裹里装个小本子，遇到了这样的“印玺”，就敲个小小的章子，捂热藏匿。春节也代替文字复原了很多情感仪式，有些时候我也情愿承认，今天我们的文字输给了影像，我们的文字输给了音乐，我们的文字也输给了文字。不过，关于春节，关于故乡，应该是一个陈述句，不该诘问吧。

胶东渔谚曰：“清明谷雨，百鱼上岸。”还有人编故事，说南海海域不值钱的“马鲛鱼”一路奋力游到黄海海域，易名“鲅鱼”，冷热水交替过后拥有了新生，更变得身材修长、鲜美丰美。可惜，今年的鲅鱼要再等等时日才能吃到。春节期间，当地人互相赠送的是“海钓鲈鱼”，也是又白又亮，鲜美得紧。踏上归途时，一个从不喜欢带行李的人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“甜酥鲅鱼”和烤虾带上了火车。

抵沪已是半城春雨半城风的季节，有水即好。



崂山松石 吴冠中

皮以毛存

徐建融

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的典故众所周知。但“毛之不附，皮将焉存”却是钱锺书先生为我们找出的同一事物的另一面。其《管锥编》有曰：“毛本傅皮而存，然虎豹之鞞，狐貉之裘，皮之得完，反赖于毛。”鞞，指去毛的皮即皮革。《论语》中讲到，虎豹的皮如果拔光了毛，就如同狗羊皮，一点不受人的待见。而狐貉之裘（皮革）却因为上面的毛茸茸所以格外地为人们珍惜。钱先生此说，是针对东汉焦贛寿的《易林》而言的。

《易林》是一部占卜书，作者深知“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”的道理，所以措辞藻饰十分用心，四字一句，优美雅雉，琅琅上口。到了明代中叶，大为文艺之士如钟惺、谭元春辈所青睐，竟推为诗筌艺筏，认为与《三百篇》并为四言诗之短卷。对此，清代的冯班斥之为“直是不解诗，非但不解《易林》也”。于是，钱先生便有了这样一段议论：

卜筮之道不行，《易林》失其要用，转藉文词之末节，得以不废，如毛本傅皮而存，然虎豹之鞞，狐貉之裘，皮之得完，反赖于毛。古人屋宇、器物、碑帖之类……厥初因用而施艺，后遂用失而艺存。文学亦然。

不仅占卜之书的《易林》被当成了文学之书，舆地之书的《水经注》，伴随着地理科学的发达而失其舆地之用，同样被当成了文学的创作。如张岱《跋寓山志之二》有云：“古人记山水手，太上鄙道元，其次柳子厚，近时则袁中郎。”钱先生反诘：难道这也是“直不解文，非但不解《水经注》”吗？

钱先生没有举宗教艺术的例子。那些中外伟大的宗教艺术品，如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、麦积山石窟、大足石窟的雕塑壁画，如达·芬奇《最后的晚餐》、米开朗琪罗《末日审判》、拉斐尔《西斯廷圣母》，当初的创作宗旨，无不是为了更好地吸引信众以宣传宗教的思想。人们在它们面前的顶礼膜拜，更多的也是起皈依之想，而绝不是审美之思。然而，当文明的发展走出了迷信的虚幻，我们便买椟还珠，津津于欣赏其艺术之美而全然无视其宗教的蕴涵了。具体如谢稚柳先生，当年应张大千之邀西渡流沙，面壁敦煌，叙录石室，自述：“由于我之不懂佛经，以及当时手边又无此类书籍……因此，只能笼统的记下‘经变’或‘佛传图’而已。这说明都是很不够的。”但佛学上的“不够”，一点不妨碍他从中取得明清的卷轴画与眼前的壁画“正如池沼与江海之不同”的艺术真经！

踏进同一条河流”，所以“用”失其用，其人便只能以艺传了。一旦无艺可传，便不免“身与名俱灭”了。顾亭林《日知录》认为，韩愈文起八代之衰，但仅凭《原道》《原毁》《平淮西碑》诸篇而不作诗文，“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”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不作诗文，韩愈的名字仅凭他的功业真能传诸后世吗？裴度的功业高出他不知多少，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

“人以艺传”有三种不同的情况：其一，像颜真卿、欧阳修，既有高尚的品德、丰伟的功绩，又有华赡的文艺，至后世，“用”失其用，人们因其“艺”而犹重其人；然重其人却不一定知晓其具体的功业行实为何。其二，像李白、米芾，虽无值得称道的品德功绩而无大亏，但“天之付与，能者得之，故号一艺”，虽“不足恃”“皆可悲”，人们却爱其“艺”而存其人。其三，像薛稷、赵佶、赵孟頫、张璪、王铎等，或品德低劣，或行有大过，但文艺成就卓著，我们不可因人废艺，所以不妨重其“艺”而存其人，虽存其人却不重其人。陈继儒称董其昌“生前画以宣传，身后画以画传”；张之万以状元而达官，生前画名籍甚，但实质画艺平平，所以身后官名、画名皆不传，无不证明了“皮以毛存”的充要条件。

杜甫评薛稷有云：“惜哉功名过，但见书画传。”对第三种“人以艺传”情况的评价，大体是公允准确的。但米芾《画史》却斥为谬论，以为：

嗟乎！五王之功业，寻为女子笑。而少保之笔精墨妙，摹印亦广，石勒则重刻，绢破则重补，又假以行者，何可数也！然则才子墨士，宝钿锦，纛数数十以珍玩，回视五王之炜炜，皆糠粃埃壒，奚足道哉！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远甚明白。

珍重薛稷的书画艺术当然没错，但因艺重人，把他的社会贡献推到压倒五王（张柬之、崔玄暉、敬晖、桓彦范、袁恕己）的地位，实在是颠倒黑白、倒置本末了！

五王于武则天重用张易之、张昌宗胡作非为、祸国殃民之际，发动“神龙政变”，迫使武周还政于唐，为紧接着的“开元盛世”奠定了基础。《新唐书》论其功绩之伟相当于陈平、周勃的诛吕灭吕。而薛稷则以唐王朝的累世重臣，参与到太平公主、窦怀贞的谋逆事件。五王之于文艺，我们固然可以忘怀他们的功业“炜炜”，但怎么说他们的功业“皆糠粃埃壒”呢？薛稷确实文艺超群，但附逆谋反，怎么能说他的功绩远胜五王呢？米芾此论，实开今天的某些“孺子”把明星的成就置于两弹元勋之上之先声，是我们所决不能同意的。倒是《昭明文选》谢灵运的“石门新营……”诗“清醪满金樽”句，李善注引曹植《乐府》：“金樽玉杯，不能使薄酒更厚。”谓美器无补于恶食——论“皮”与“毛”也即“用”与“艺”的关系，实在再清楚不过：我们可以同意并肯定“人以艺传”“皮以毛存”“买椟还珠”，但决不能盲目简单地因艺誉人、因毛夸皮、因椟誉樽。

所谓“君子好色而不淫”，我们不妨“好色甚于好德”，但绝不可好色而诋德、誉恶！



青岛红楼 吴冠中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本版配图均选自中华艺术宫（上海美术馆）“中国式风景——林风眠、吴冠中艺术大展”